

论江泽民的政治文化建设思想

刘晓春

(淮海工学院法学院 江苏 连云港 222005)

【内容摘要】江泽民的政治文化建设思想十分丰富,譬如,他提出了以“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为导向的政治价值观,构建了以“依法治国、以德治国”为模式的治国方略,论述了以“政治文明”为重要内容的“三个文明”建设思想等等。这些思想观点不仅自身和彼此之间有着密切的辩证关系,而且也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存在着一脉相承的内在逻辑联系。

【关键词】江泽民 政治文化 “三讲” “依法治国、以德治国” “三个文明”

中图分类号:D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9106(2011)08-0008-04

江泽民作为我们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其政治文化建设思想十分丰富,他的政治文化建设思想不仅是他本人思想、观点、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我们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智慧的结晶,是我们党在世纪之交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伟大实践所取得的新成果、新经验,也是当代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内容,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起到了承前启后的历史作用。为此,进一步系统概括、总结与弘扬江泽民的政治文化建设思想,对于大力推进当前我国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先进文化)建设,对于我们深入持久地开展好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都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一、以“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为导向的政治价值观

在1995年9月27日中共十四届五中全会召集人会议上,江泽民就部分党员干部放松世界观的改造而腐败堕落的问题,发表了“领导干部一定要讲政治”的重要讲话,特别强调党的高级干部一定要讲政治,在政治问题上,一定要头脑清醒,并表明他所说的政治,“包括政治方向、政治立场、政治观点、政治纪律、政治鉴别力、政治敏锐性。”^{[1](P457)}

1995年11月8日,江泽民在北京市考察工作时发表重要讲话,就有些地方、部门和社会领域出现一些消极混乱现象,认为必须加强对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的教育,指出:“根据当前干部队伍的状况和存在的问题,在对干部进行教育当中,要强调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1](P483)}(简称“三讲”)从而首次将“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作为一个完整的概念提了出来,并对“三讲”的内容进行了系统的阐述。

(一)江泽民为什么要对干部提出“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的要求?

应该说世情、国情、党情的新变化,是江泽民之所以要对干部提出“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要求的时代背景和根本原因。

第一,我们的干部要带领人民群众完成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需要“讲学习”。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我们也要清醒地认识到,我国依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我们的综合国力还不强,人民生活还不富裕,我国建设和发展的任务还十分繁重、艰巨,我们的干部作为我们党和政府治国理政的具体组织实施者,要肩负起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任,特别需要加强学习。

“讲学习”既是一种态度、一种精神,也是一种能力和水平,要求我们的干部既要有勤奋好学的态度和精神,又要有渊博的学识和驾驭复杂局面的能力,因而必须努力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必须努力学习法律知识、经济知识、历史知识和其他科学文化知识。只有不断努力学习,我们的干部才能提高思想境界,才能开阔认识视野,才能提升工作能力和水平,才能不辱神圣职责和光荣使命。

第二,我们的干部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面前要始终坚定自己的政治信念,需要“讲政治”。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苏东剧变,西方各种敌对势力不断利用所谓人权、民主、自由、民族、宗教等问题,加紧了以各种手段和方法对我国实施和平演变,因此,我们的干部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要警惕西方敌对势力西化、分化我国的政治图谋,要反对台独、藏独、疆独分裂祖国的行为,要抵制封建主义、资本主义腐朽思想文化的侵蚀,需要“讲政治”,需要坚定自己的政治理想、政治信仰、政治立场、政治观点,需要提高自己的政治鉴别力和政治洞察力。

第三,我们的干部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要能经受金钱美色等糖衣炮弹的攻击,需要“讲正气”。

什么是“正气”?正气就是浩然之气、凛然之气,就是高

* 作者简介:刘晓春(1963-),男,淮海工学院法学院副院长,教授,法学硕士,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政治学。

尚的气节和情操,就是公平、公正之心和社会正义感、责任感、良知感,就是公私分明、虚怀若谷、光明磊落的情怀。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社会各种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日益多样化,社会的各种矛盾相互交织、各种价值观相互激荡,在金钱美色等利欲诱惑面前,我们的干部要能经受考验就必须“讲正气”,就必须牢记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就必须同以权谋私、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等歪风邪气作坚决的斗争。

(二)“三讲”的提出以及“三讲”教育活动的开展有什么意义?

“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是江泽民作为我们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根据形势的变化和时代的特点,对新时期的党员干部提出的标准和要求,这种标准和要求既是我们党员干部进行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改造的目标和途径,也是我们党员干部通过自我修养、自我教育而不断提升自己综合素质的措施和范式。在“三讲”中,“讲学习”是前提和基础,“讲政治”是核心和关键,“讲正气”则是具体体现和要求,三者是内在统一的关系。“三讲”的提出对于我们党员干部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保持自己的先进性,既指出了路径,又明确了方向。

在“三讲”提出后不久,我们党于20世纪90年代后期在县处级以上党政领导干部中,集中开展了一次以“三讲”为主题的教育活动,这次教育活动无疑是我们党在新的时期富有时代特色的一次整风式的党性党风教育活动,对于改进广大党员干部的思想作风、工作作风、生活作风,对于进一步推动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具有重要的意义,也为我们党在21世纪初先后开展的“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创先争优”活动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二、以“依法治国、以德治国”为模式的治国方略

在1996年2月8日中共中央举办的中央领导同志法制讲座会上,江泽民第一次正式提出并明确界定了“依法治国”的概念,指出:“实行和坚持依法治国,就是使国家各项工作逐步走上法制化的轨道,实现国家政治生活、经济生活、社会生活的法制化、规范化,就是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依照宪法和法律的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就是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1]P511}

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江泽民指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跨越世纪的发展,要求我们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继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进一步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2]P28}并强调“依法治国,就是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保证国家各项工作都依法进行,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2]P28-29}从而第一次把“依法治国”写入了我们党的纲领性文件,也正式

把“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作为我国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战略目标和治国基本方略。

在提出“依法治国”方略不久的2001年初,江泽民在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又首次提出了“以德治国”的概念,认为“我们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依法治国;同时也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以德治国。对一个国家的治理来说,法治和德治,从来都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二者缺一不可,也不可偏废。”^{[3]P200}强调“我们要把法制建设与道德建设紧密结合起来,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紧密结合起来。”^{[3]P200}至此,江泽民的以“依法治国、以德治国”为模式的治国方略正式形成。

(一)江泽民为什么要提出“依法治国”的方略?

正如江泽民在十五大报告中所说,“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需要,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障”^{[2]P29}。

第一,因为依法治国,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需要。

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而市场经济必须是法治经济,必须以法治作为保障和后盾,这一点江泽民十分清楚,他在论述市场经济和法制的关系时曾指出,“世界经济的实践证明,一个比较成熟的市场经济,必然要求并具有比较完备的法制。市场经营活动的运行、市场秩序的维系、国家对经济活动的宏观调控和管理,以及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等各个环节,都需要法律的引导和规范,在国际经济交往中,也需要按照国际惯例和国与国之间约定的规则办事。”^{[1]P511-512}所以,若不实行依法治国,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空话。

第二,因为依法治国,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

社会文明主要包括社会的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而民主和法治都属于政治文明,民主和法治彼此又密不可分,民主要以法治为基础和前提,法治要以民主为形式和体现,既然以民主和法治为主要内容的政治文明的进步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组成部分,理所当然依法治国就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翻开人类社会的发展史我们不难发现,法是人类进入文明时期的产物,法治是人类由传统的封建专制(人治)社会向现代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民主社会发展的根本标志,因而依法治国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也就毋庸置疑。

第三,因为依法治国,是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障。

社会要维持正常的生活需要规范,国家要保持安定的环境需要秩序,而规范和秩序都是法治的具体体现。包括我国十年“文革”在内的古今中外无数事实都说明,一个动荡、动乱的社会,一定是一个没有规范和秩序的社会,一定是一个不讲法纪的社会,而受害者又必定是我们这些普通百姓。今天,我们生活在一个利益日益分化和矛盾纷繁复杂的社会,要保障国家的长治久安,要维护社会秩序的长久稳定,尤其需要加大法治建设的力度,因为打击敌对势力和各种犯罪活动需要依靠法律武器,化解纷繁复杂的人民内部矛

盾同样需要运用法律手段。

(二)在提出“依法治国”几年之后,江泽民为什么又要提出“以德治国”的概念?他为什么强调要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紧密结合起来?

从提出“依法治国”的概念到最终形成“依法治国、以德治国”的方略,大约经历了五年时间,从中我们不难看出,江泽民的治国理政思想有一个逐步成熟和完善的过程,而这一过程,包涵着我们党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经验与教训的深刻反思,也体现了我们党对古今中外治国理政思想的科学总结。

在我国的传统政治文化中,儒家的德治(礼治、仁治)思想占居着主导地位,使得我国的德治历史特别悠久,这种崇尚贤人政治的德治理念,固然有着许多积极的因素,但不可否认的是,缺乏法治前提的德治理念,极易演变为人治思维,从而形成专制政治。

反观西方国家的政治发展史,西方文明自古希腊以来就有着传统的法治精神,走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之后更是崇尚“法治至上”、“法治万能”,可我们谁都知道,法治并不能也没有解决资本主义社会的诸多矛盾。

同样,我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尽管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法治建设也有了长足的进步,但人们普遍感觉到社会的政治思想、道德品质的水准却并不尽人意,甚至出现了严重的滑坡,贪污腐化、拜金主义、个人主义盛行。

这就充分说明,不以“法治”为主导的“德治”传统已不符合时代发展的要求,而只片面强调“法治”重要性的“法治唯一”论、“法治万能”论,也不是治国经世的灵丹妙药。经过对古今中外诸多经验和教训的反思而得出的科学结论是,最有效的治国之策必须将“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紧密结合起来,并且要注意的是,这里的“德”是一个内涵非常丰富的概念,不仅指道德品质,还包括人们的政治思想、政治理想、政治信念等。

(三)“依法治国、以德治国”方略具有什么理论和实践意义?

江泽民“依法治国、以德治国”方略在理论上如下意义:第一,这一治国方略是对中国传统的以德治(礼治、仁治)为主导(即“德主刑辅”)的治国之道的批判与继承。第二,这一治国方略是对西方社会崇尚“法律至上”的法治理念的汲取与超越。第三,这一治国方略也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法治是民主的法治、人民的法治等法治思想的发展与创新。

从实践的角度而言,由于“依法治国、以德治国”方略源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际,是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规律的科学认识,特别符合我国的国情,因而这一治国方略对我国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对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也必定会产生重大而深远的积极影响。

三、以“政治文明”为重要内容的“三个文明”建设思想

在2001年1月10日召开的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江泽民指出:“法治属于政治建设、属于政治文明,德治属于思想建设、属于精神文明。”^{[3]P200}从而首次使用“政治文明”这

一科学概念,2002年7月16日在考察中国社会科学院发表的重要讲话中,江泽民则把“三个文明”放在一起进行阐述,强调:“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应是我国经济、政治、文化全面发展的进程,是我国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全面发展的进程。”^{[3]P490-491}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江泽民向全党明确提出了“三个文明”建设的历史任务,指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就是要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不断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推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3]P574}

(一)江泽民为什么要提出“三个文明”建设的课题?

在新世纪之初,江泽民之所以要提出政治文明的概念,之所以要把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与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摆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一并确定为我们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基本目标,笔者认为,这既是源于21世纪初,在中国的改革开放进入到了关键时期和攻坚阶段,中国共产党人在继续推进经济和文化建设进程的同时,决心加大推进民主政治建设的进程,以促进我国社会协调发展和全面进步的时代背景;也是中国共产党人执政理念的一次重大创新,即我们党执政的目的不仅是要最大程度地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需要,还要让人民群众的政治权益和民主权利得到更加切实、充分的尊重和保障。

众所周知,马克思在分析人类社会的本质和发展规律时,曾经有这样的阐述:“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4]P82}在此,马克思将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的对象分为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三个方面。因而,与之相对应反映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即人类社会文明,也理应包括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三个组成部分。人类在经济领域中创造的财富,主要表现为社会物质生产和经济生活的进步即物质文明;在政治领域中创造的财富,主要表现为社会政治建设和政治生活的进步即政治文明;在文化领域中创造的财富,主要表现为社会精神产品和精神生活的进步即精神文明。人类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实际就是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三者的协调发展和进步。固然,由于马克思所处的时代还不是社会主义运动蓬勃兴起的时代,因而,他没有明确地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这样的术语来表述人类社会经济、政治和观念(文化)发展的程度和成就。而社会主义建设已推进到21世纪初并已取得了巨大成就的中国,正是具备了促进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共同发展和进步的条件。

(二)“三个文明”与邓小平提出的“两个文明”之间存在着怎样的内在逻辑关系?

邓小平在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中,既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又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他不仅科学地、系统地

阐述了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内涵及其两者的辩证关系,多次明确指出,只有两个文明一起抓,两个文明协调发展,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而且在邓小平的思想中,政治文明建设一直也是他看重的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内容,如在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上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就指出,逐步建设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是社会主义革命的根本任务之一。并把逐步建设现代化的、高度民主的、高度文明的社会主义强国确定为党在新的历史时期的奋斗目标。

诚然,由于邓小平晚年所处的时代是我国改革开放的发起和初期实践阶段,而这一时期我国改革的任务主要是侧重在经济领域的经济体制改革,尽管小平同志生前非常重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强调要加强民主与法制建设,但由于政治体制改革在当时来说还为时尚早,或者说时机还不够成熟,因而,邓小平也就没有能够明确提出“政治文明”这一概念。

进入21世纪,由于国际、国内复杂的新形势,也出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要求,我国的改革重心已进入到政治体制改革的攻坚阶段,民主政治建设成了深化改革的关键。即一方面,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的进一步推进需要更强有力的政治动力、政治保障;另一方面,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的巨大成就也为政治文明建设奠定了扎实的物质基础,提供了足够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可以说,加大推进政治文明建设,以促进我国社会和谐、协调发展与全面进步的条件已经具备。因此,江泽民才会适时地作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1](P553)}的论述,并将政治文明建设与物质文明建设、精神文明建设放在同等重要的战略位置。

有的人认为,邓小平所强调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中已涵盖了政治文明,因而单独提出政治文明且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并列,似乎不太合适,也无太大必要和意义。的确,精神文明从广义上来说,应该包涵了政治文明的因素,但江泽民之所以要把政治文明从精神文明中剥离出来,恰恰说明了我们党在新的世纪,要凸现和强化民主政治建设的决心和信心。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三个文明”观点既是“两个文明”思想的题中应有之义,又是对“两个文明”思想的丰富、发展与创新。“三个文明”较之“两个文明”有着更为广泛和普遍的社会意义,因为其中的“政治文明”反映的是执政党的公信度、政治制度的合理性以及民主法制的健全程度。对我国而言,“政治文明”主要表现为党的建设、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法制建设取得的积极成果,党的英明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是其三大基本特征。

(三)“三个文明”的提出具有怎样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三个文明”观点,深刻地揭示了社会主义经济、政治、

文化建设的内在辩证关系,不仅有助于我们加深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全面理解,也为我们更加准确地把握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跳出审视社会发展单一视角的局限,转向多视角、全方位看待社会进步以推动社会全面建设和发展,提供了更有针对性的理论指导。

四、“三讲”思想、“依法治国、以德治国”方略、“三个文明”观点之间及其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关系

江泽民的“三讲”思想、“依法治国、以德治国”方略、“三个文明”观点不仅各自内部是相互关联的统一体,而且彼此之间存在着非常密切的辩证关系。另外,从江泽民政治文化建设思想的形成和发展轨迹来看,他的“三讲”思想、“依法治国、以德治国”方略、“三个文明”观点与其“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之间也是一脉相承的内在逻辑关系。

首先,“三讲”是实施“依法治国、以德治国”方略和推进“三个文明”建设的要求、条件、前提,实施“依法治国、以德治国”方略和推进“三个文明”建设则是“三讲”的最终目的和价值依归。“三讲”针对的是党员干部,强调的是我们的党员干部只有不断提高个人素质,才能肩负起作为我国“依法治国、以德治国”方略实施者、承担者和“三个文明”建设组织者、领导者的重任。也就是说,不“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的党员干部队伍,不会是一支高素质的队伍,而没有一支高素质的党员干部队伍,“依法治国、以德治国”方略的实施和“三个文明”建设的推进就无从谈起。

其次,由于“法治”属于政治文明,德治属于精神文明,故而“依法治国、以德治国”与“三个文明”之间实际上是相互包涵、相互促进的关系,即要实施“依法治国、以德治国”方略就必须推进“三个文明”建设,反之亦然。

再次,“三讲”思想、“依法治国、以德治国”方略、“三个文明”观点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之间也存在着同根同源不可割裂的关系。因为中国共产党作为我国的唯一执政党,只有要求自己的党员干部“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才能始终保持党的先进性,同时,我们党也只有坚定地实施“依法治国、以德治国”方略和大力推进“三个文明”建设,才能真正实现自己“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政治理想。

参考文献:

[1]江泽民.江泽民文选(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2]江泽民.江泽民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3]江泽民.江泽民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4]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